

# 大众周末

历史影像



徐志摩曾一度出任《新月》主编。



1924年泰戈尔访华期间，徐志摩和林徽因同为泰戈尔的翻译。



徐志摩与陆小曼的婚恋曾广受社会关注。



徐志摩曾住过的小石虎胡同一角。

## 周末人物 新文学先锋 纪念文学革命100周年

新文学革命中，“新月社”与“文学研究会”“创造社”等社团一样发挥了重要作用，而徐志摩是灵魂人物。也许是文名太盛、俗名太艳之故，他思想精进，富有社会担当的一面被遮蔽了。今年是徐志摩诞辰120周年，11月19日又是徐志摩在济南遇难86周年。

# 韩石山：告诉你一个真实的徐志摩

□ 本报记者 逢春阶 王建



### “他恨不能战死在沙场上”

徐志摩像一团火，在他所处的时代，不遗余力地燃烧着；也像一颗星，闪耀在墨一般黑的苍穹。徐志摩和他的同代人一样，都在探索，他改造中国社会的宗旨，就是“理想主义”，做有理想的人，行有理想的事。

“关于徐志摩的死，多少年来，人们总是说，他所以急着赶回北京，是为了听林徽因给使馆人员讲建筑，而搭了送邮件的飞机送命的变故。事实是，当时中国已有了航班，只是坐飞机的人太少，徐志摩是大名人，航空公司为了拓展业务，送给徐志摩一张免票，这张票可随时坐航班的飞机。那天徐到了南京，第二天要北去，打电话问过机场，没有航班，只有送邮件的飞机，无奈之下，只好坐了这架小飞机。”韩石山先生说，“我认为，他所以匆匆离开上海，直接原因是与陆小曼吵翻了，急着赶回北京，还因为局势变化太快，他想有所作为。须知，从北京到南京，他坐的是张学良的专机去的，专机是送张学良的外交顾问顾维钧，向南京方面请示处理东北危急的方略。两人同乘飞机，又是好友，东北、华北的情况应该都能谈到。也就是说，沈阳方面，最近有大的变故，他是知道的。1931年11月18日到南京，晚上去看望杨杏佛，杨杏佛不在家，留了个条子，这个条子，便成了志摩的绝笔。是这样写的：‘才到奉天，未晤为憾。顷到湘州，明早飞北京，虑不获见。北京闻颇恐慌，急于去看。杏佛兄安好。志摩。’北京闻颇恐慌，急于去看看，这才是他急于赶回北平的真正的原因。”

对那段历史，韩先生梳理如下：1931年10月29日，徐志摩决定和外交官顾维钧一道，乘张学良的专机南下。此前因顾维钧一再延期，徐志摩不得不在北平逗留了十几天。这十几天，他几乎与北平的好友都见了面。一次次的见面，竟成了彼此皆不知的诀别仪式。在徐志摩去世后的友人悼念文章中，这些“诀别”常被提及。其中与剧作家熊佛西最后的长谈，颇值得深究。“某夜，我们在勺园小集，记得那是深秋阴霾天气，北风呼呼地刮着窗纸，落叶纷纷在院内卷起。熊熊炉火，一杯清茶，我们互谈心事，他说往事如梦，最近颇想到前线去杀敌！他恨不能战死在沙场上！他什么样的生活都已经历，只没有过战场上的生活！他觉得死在战场上是今日诗人最好的归宿。”徐志摩去南京前后，九一八事变的炮声刚过，民族危亡激起了他体内的血性。

韩先生感慨道：“徐志摩在人生的最后几年，也就是上世纪90年代末，对政治的热情一度有所消退，但在九一八事变后，他的爱国热情再度高涨了。可以说，一直到死，他都是一个赤诚的爱国者，为时局担着心，为这个老大民族担着心。”

“现在对徐志摩的全面评价还太早，我们只能说徐志摩是个杰出的诗人，是一位杰出的社会改革家，社会活动家，他留给历史的遗产是丰富的。他走了，留给我们的永远是永远的怀念，是对一个时代文化的永远的怀念。”韩先生最后说。

11月2日上午，我们在北京的锡拉胡同、腊库胡同、老北大旧址等地流连。这些地方，徐志摩曾经逗留过。看到今日的繁华，看到现代人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兴路上自信的步伐，“浪漫而不颓废”的徐志摩应该感到欣慰吧。

责任编辑 郭爱凤



吴文峰/摄影

在2012年6月4日举行的“2012中国济南徐志摩研讨会”上，韩石山先生（左）将所编著的《徐志摩全集》《徐志摩图传》赠与特意从美国赶来的徐志摩长孙徐善曾（中）及家人。

家，他立志要当中国的汉密尔顿（Hamilton），汉密尔顿是美国开国元勋、首任财政部长，在美国建国过程中，贡献仅次于华盛顿，尤其文化事业上，办报纸开民智。徐志摩要当一个汉密尔顿，想做中国的社会领袖，对中国文化建设和制度建设作出努力。这点人们过去忽略了。他有这个理想，一直注重文化建设，从更高层次上引领古老的国家往现代化上走。他到美国后，还取了个英文名‘汉密尔顿’。”

在美国，徐志摩先入克拉克大学历史系，选学课程是《欧洲现代史》《19世纪欧洲社会政治学》《商业管理》《劳工问题》《社会学》《心理学》等。因学分不够，他在抵美后的第二年夏天，又进入康奈尔大学暑期班修了4个学分。

但徐志摩真正收获的并非是课堂上的知识，而是被点燃的爱国热情。美国当时正经历一战的冲击，物价上涨，物资匮乏，但人们毫无怨言。1918年11月，当一战胜利的消息传来，人们涌上街头欢呼庆祝，发自肺腑地为国家骄傲。徐志摩初到异邦就旁观了这一幕，感触颇深。韩石山说：“徐志摩与同宿舍的董任坚、张道宏、李济共同订立章程，发奋向学。章程的内容除了早起早睡，多运动、多学习以外，还有每天7时朝会（激耻发心），傍晚面对祖国方向，高唱国歌。”

在中国政府承认丧权辱国的中日“二十一条”后，留美留日的中国学生“痛愤‘国耻’，遂有‘中国国防会’之组织”，“欲唤醒国人，团结民众，共事抵抗外国之侵略与凌逼，以救亡图存”。

与其穷居，不如张扬。徐志摩约了李济、周延鼎等人，在1918年12月21日抵达波士顿，并在次日来到了哈佛大学。不仅加入了“国防会”，还结识了吴宓、赵元任、梅光迪等中国留学生。

1919年底，获得克拉克大学一等荣誉学位后，徐志摩来到纽约，进入汉密尔顿的母校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，专攻政治学。极具压迫感的新环境，一方面进一步激发了他的爱国热情，另一方面也让他对社会思想产生了兴趣，成了中国学生口中的“鲍尔雪维克”，即布尔什维克。他的目光不再停留在实业救国，转而关注社会问题。

1920年，徐志摩结束了在哥伦比亚大学的日子，想去英国剑桥大学研究院读博士。这一次，他追随的目标，变成了哲学家、和平主义社会活动家伯特兰·罗素。

韩石山先生说：“徐志摩到了英国才知道，罗素到中国讲学去了。这样徐志摩就在伦敦住下来，认识了林徽因的父亲林长民，林长民当过北洋政府的司法部长，政坛失意后，就带着女儿林徽因到了伦敦，在林长民家里，徐志摩与林徽因相识了。当时林徽因16岁，徐志摩24岁。”

### “罗素给了他敏锐的社会意识”

到英国后，徐志摩进入伦敦政治经济学院，师从英国社会主义主要思想家拉斯基教授，开始了一些政治实践。比如，他曾随拉斯基夫人去伍利奇码头参观选举。这一时期，徐志摩给梁启超和蒋百里创办的《改造》杂志写了几篇文章，谈的大都是政治话题。

1921年春，徐志摩在好友狄更生的介绍下，进入剑桥大学王家学院（即国王学院）就读。同年10月，也是从好友欧格敦那里，他得知罗素从美国回到英国并拿到了地址。他立刻写信请求见面，并在一个星期后如愿以偿。徐志摩发乎本心的崇拜、夸赞和尊重给罗素留下了深刻印象。他成了罗素家中的常客，常往返于剑桥与伦敦，聆听罗素的教诲，参加其倡导的各种活动。“在英时期，要论对徐志摩影响最大的人，还是罗素。……罗素给了他敏锐的社会意识。”韩石山道。也就在这一时期，徐志摩基本转向了罗素式自由主义的思想。

1922年8月，徐志摩突然决定回国，放弃剑桥大学的博士学位。主要原因是他的老师梁启超有一个“中国的文艺复兴计划”。

梁启超是一个干预社会、敢于担当的文人，其主导的大部分文学活动，都可以说是具有政治意味的，他也如此影响着徐志摩。在韩石山看来，梁启超召唤徐志摩回国参与的“中国的文艺复兴计划”，就是以其为首的“研究系”要做的一个振兴中国文化的大计划。徐志摩从事的许多活动，比如创办“新月社”，接办《晨报副刊》，起意在中国模仿泰戈尔在印度搞的乡村建设等等，都可以说是梁启超的“中国的文艺复兴计划”的一部分，至少也和这个计划相呼应。

### 一言难尽的“石虎胡同七号”

“我们的小庭院，有时荡漾着无限温柔：/ 善笑的藤儿，袒酥怀团团的柿蒂绸缪，/ 百尺的槐翁，在微风中俯身将棠姑抱接，/ 黄狗在篱边，守候睡熟的珀儿，它的小友，/ 小雀儿新制求婚的艳曲，在媚唱无休……”

这是徐志摩新诗《石虎胡同七号》的开头，诗人把自己的意趣赋予小庭院的一景一物，把它们拟人化，还赋予它们人的性格、神态、动作。他写它们间的情意，写它们和睦融洽得像一个家庭，使整个小庭院洋溢着欢愉的气氛，充满着生机盎然的诗趣。

北京石虎胡同七号，是徐志摩从英国回来，在北京逗留时间较长的地方，这是明清时代的王府大院。后来“新月社”的牌子也是挂在这里，徐志摩还在这里接待过印度诗人泰戈尔。韩石山说：“1923年春，经梁启超推荐，

徐志摩进北京松坡图书馆当了英文秘书。松坡图书馆有两个院子，其中一处在西单附近的石虎胡同7号，是外文馆，徐志摩就住在这里。松坡图书馆是为纪念护国将军蔡锷而建的，梁启超担任馆长。”

石虎胡同七号院，还是新月社俱乐部的所在地。

在徐志摩回国之前，已经出现了两个颇具声势的文学社团，一个是“文学研究会”，一个是“创造社”。这两个文学社团可以说都是由五四运动精神催生的，都有不可抹杀的功绩。韩先生认为，赓续五四精神、影响广泛的还要数1923年徐志摩首倡成立的“新月社”。“新月社”之名，出自诗人泰戈尔的《新月集》，徐志摩曾一度出任《新月》主编。梁实秋晚年回忆说：“胡适先生当然是新月派的领袖，事实上志摩是新月派的灵魂。”他给新月派带来生气，带来和气，是“黏着性的、发酵性的”。

11月1日下午，我们来到徐志摩曾经寓居的地方寻访，传说，胡同里原有座古庙，庙前有座石雕小虎，胡同因此而得名。1965年整顿地名时易名为“小石虎胡同”，胡同很短，但成了繁华的商业街，熙来攘往的人群，已经无暇顾及这里曾经活跃过的一个文人群体。

韩石山说，最能说明徐志摩的诗在那一代人中影响的，应该是这样一件事。张幼仪有个弟弟叫张禹九，虽说徐志摩和他姐姐离婚了，但是他一点儿不反感徐志摩。他晚年在美国，他的孙女采访了张幼仪，要写一本书，他嘱咐孙女，写的时候，对徐志摩要留情。张禹九临终前留下遗嘱，说我死后，不要放哀乐，朗诵几首徐志摩的诗就行了。

### 他没有文学青年的肤浅

“徐志摩不是一个纯粹的诗人。他毕竟是学政治经济的，对当时中国的社会问题有独立的思考，也常有发表的欲望。1923年冬，张幼仪的二哥张君劝一说要办《理想》杂志，他就迫不及待地写《政治生活与邻家三阿嫂》《青年运动》等文章。回国后，到1926年徐志摩跟陆小曼再婚南下，是徐志摩一生最辉煌的时期，在建树诗人声望的同时，徐志摩更多的是以时政评论家的身份说话，过去人们忽视了，他是在传播现代社会理念，改造传统社会认知上的努力与贡献，从在国外所受的教育看，从他的个人兴趣看，这才是他用心最多、用力最大的地方，这一时期，他写的随笔，几乎全是社会论文，对社会上某一事件某一现象提出自己的看法，宣传新理念，纠正谬误开风气。”韩石山特别放大大声强调了两句，这也是他最佩服徐志摩的地方。

宁鸣而死，不默而生。徐志摩在接办《晨报副刊》后，那里成了他传播现代理念的阵地。他对中国社会的看法，对现行的中国政治的意见，都刊登其上。1926年3月12日，日舰袭击大沽口炮台，我军还击，史称“大沽口事件”。是时，徐志摩就被困在大沽口外的通州轮上，听着传来的阵阵枪炮声。回北平后，因八国要求拆除大沽口国防设施的通牒引发“三一八”惨案，让徐志摩真是难抑愤怒，写下了《梅雪争春（纪念三一一）》。在他主持的《晨报副刊》上，闻一多、饶孟侃、杨世恩等人都纷纷发表诗文谴责北洋政府的暴行。《晨报副刊》上的《诗刊》创刊号几乎成了“三一一”惨案纪念专号。

韩先生认为，新文化运动的各位学者，真正受过完整学术训练的，徐志摩几乎是唯一一个。他先后受过法学、历史学、政治学、经济学的训练。像这样一个社会学家，当时中国几乎没有的。包括胡适学历史上根本没法和徐志摩比，一开始到美国的农学，在国内没上好学校，后来转到哲学，沾了点儿边。所以徐志摩看问题，就没有一般文学青年的肤浅。

且看当年对苏俄的态度，就知道徐志摩的见识。1923年，他曾写过一篇文章，赞美苏俄公使馆前升旗仪式，对苏俄公使加拉罕先生的形象，赞美有加。说那面徐徐升起的红旗，是一个伟大的象征，代表人类史上最伟大的一个时期，不仅标示俄国民族流血的成绩，却也为人类立下了一个勇敢尝试的榜样。那时他还没有去过苏俄，只能从表象上作出自己的判断。

1925年春，因为与陆小曼的异常的婚恋，响动太大了，决计去欧洲避风头，便取道西

11月1日和2日，本报记者在考察徐志摩的寓居地，并采访了著名作家、徐志摩研究专家韩石山先生。

采访韩石山先生非常愉快。在北京丰台区一家叫榆林镇筋饼春饼的小店，啜一口自备的清茶，抿一口山西汾酒，来一勺山西老醋，吃一筷子山西小菜，晋人韩先生就来劲儿了：“世人徐志摩的了解，仅止于他的诗歌与散文的欣赏，津津乐道于他的爱情故事，并没有对其个人品质和社会理念进行深入研究。事实上，徐志摩是一个思想精进，很有社会担当的人。他回国后，几乎参与了当时所有政治与思想方面的论争。撇开那些风流韵事，我们才能走近真正的徐志摩。就让我告诉你一个真实的徐志摩吧。”

韩先生有资格说这个话，早年以文学创作成名，近三十年来，他又潜心从事现代文学研究，接连出版了《徐志摩传》《徐志摩诗歌全编》《徐志摩散文全编》《徐志摩全集》《徐志摩图传》《徐志摩集》《徐志摩书信集》《徐志摩评说八十年》《徐志摩作品新编》《四季志摩》等十余部著作，堪称“志摩专家”。

### “这都是造化的安排！”

从1987年春赴浙江海宁寻访徐志摩故居算起，到现在，韩石山对徐氏的关注，已整整三十年了。他坦言，早先还自信满满，如今越来越迷惘，不时会纳闷，对这位江南富商的儿子，自己究竟懂得多少。天才？最简单的归拢，也是最无奈的躲避。朦胧间，他有个不太确切的看法，即在中国新文化运动的历史上，徐志摩的意义，作为一个警示，要大于作为一个天才的存在。

韩石山说，“百年来的新诗运动，自从失去建立新格律的信心，等于走上了失败的途径。能留下两行诗作，或是一个近似格言的句子，均堪称优秀。比如卞之琳的《断桥》：‘你站在桥上看风景，/看风景人在楼上看你。//明月装饰了你的窗子，/你装饰了别人的梦’，又比如艾青的‘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？/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……’而徐志摩，一首一首的诗作，让人看了还想背诵，背诵了还想不时地吟咏，这是不是在警戒？非真正有天分的，轻易别打新诗的主意。多少文化人，未必是品质恶劣，或许是一时不慎，造成婚恋的错乱，便被人斥为下流，误了前程，甚至误了终生。而徐志摩，一生都在烟花阵里打滚，妻有前贤后艳，女友有旧雨新知，有他心仪的美人，也有暗恋他的佳丽，临到故去，竟没有一个对他有怨怼之言。其前妻张幼仪，晚年曾对同姓晚辈说：‘在他一生当中遇到的几个女人里面，说不定我最爱他。’这恐怕是谁也没有想到的。”

喝上酒的韩先生，越说越兴奋，特别是说到民国名媛们：“至于徐志摩的女友，更是感人。徐志摩去世后的第三天，几位名士夫人，聚集在凌叔华家里，默默垂泪，张奚若夫人说：‘我们这一群人怎么能缺少他呢！’陶孟和的夫人说：‘这都是造化的安排！’这不是在警示人们，浪漫，轻佻，都不是罪过，单看你的品质，值不值得那么多的女人喜爱，甚至迷恋。”

韩石山分析，“单就新文学革命来说，胡适号召力，有理论上的能力，但缺少文学创造，他的新诗只开风气不为先。第一本叫《尝试集》，只是尝试了一下，是顺口溜或者古词的话。到了徐志摩，一下子在创作上就上去了，诗歌的实绩就出来了。几年前，我说过一句狠话：学写新诗而不心仪志摩者，如同不秉烛而夜行，临深渊而不知惊悚。”

### “傍晚面对祖国方向，高唱国歌”

微醺中，韩石山先生的思绪已经回到了徐志摩存在的那个年代。韩先生很“自负”，一般人不入他法眼，而70岁的他评价只活了35岁的徐志摩时，发出由衷的赞叹：“徐志摩这个人啊，是真的很了不起！1918年出国前，先在国内读过北京大学预科，上海沪江大学（浸会学院）、北洋大学法预科、北京大学法科，人家都是凭本事自己考上的啊。1918年去美国，他父亲送他去美国的时候要让他当银行